

新加坡华文 作家作品论

陈 实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为了新加坡华文文学的明天（代序）

一

新加坡华文文学是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华文文学发展的基地之一。可以认为，今日新华文学（当然还应回溯到历史上的新马华文文学）已成根深叶茂的丛林。可惜的是国人对于这一“本是同根生”的文学现象知之极少。前年，我在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新加坡华文小说家十五人集》的后记中，说过要为国人的打开一个小小窗口，让有兴趣的读者一窥新加坡华文文学这片林莽。（附带说句闲话：我们这种心愿，很遗憾地没有得到新加坡个别人士的理解，竟然有人在报上提出无端责难。当时新加坡好些朋友心有不平，劝我写文章驳斥，我没有接受这个善意的劝告，因为我担心上当：这很可能正是此人梦寐以求的，故此，我以为最好的对策是：恕不奉陪。）现在，陈实君的《新加坡华文作家作品论》的出版又从另一侧面开了另一个小小的窗口。在我国的土地上，这类窗口开得越多，自然越有利于海内外华文文学的交流，渗透与互相汲取。

二

《新加坡华文作家作品论》的一个特色，是它不仅就人

集的作家作品作出自己的评价，而且从议论中让读者看到新华文学创作走过来的道路，还隐约地揭示出新华文学创作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以及进一步提高新华文学创作水平的期望。虽然陈实君无意就这些问题进行理论上的追索，更说不上作深层的挖掘，许多都是一言带过，点到即止，但就一个评论集而论，它已经给人们留下一个鸟飞鱼跃的宽广天地，当然也给这些评论文字染上了理性的色彩。

三

近年来，有幸读到新加坡文艺界发表的一些评论文字，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多数有识之士——包括那些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相当成就，已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他们并没有躺在已经绽开的花丛中自我陶醉。由于科学把地球的距离缩短了，信息的传播快捷了，华文文学的世界性突出了，他们清醒地看到新加坡华文文学正面对着严峻的挑战，而由衷地努力提高新华文学创作水平的呼吁。

当然，提高一个国家的文学创作水平，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难免见仁见智，各抒己见。但总括而言，我以为既然成为大家的共识，并已经举步，只要朝着那共同的目标前行，即使中途会有弯路，一定可以达到目的的。

四

譬如，创作题材的开拓。

近20年来，新华诗歌小说创作题材的倾斜，没完没了地描写学园风光，家庭纷争，婚变纠葛，邻里齟齬，组屋世态

等等生活故事，这些每时每刻出现在作者身边，有些还是作者亲身经历，渗透作者激情的琐事，为作者所乐道，是很自然的。应该肯定，这类作品之中，的确也有佳作问世。我完全无意否定这类作品在文学上的价值，只是觉得这种倾斜，总给人一种题材偏狭之感，而且与现代新华社会调色板上多姿多彩的生活现实有着颇大的距离。

有人认为海外华文作家不求“载道”，只求“痛快”，写出自己身边的见闻，个人的感想就够了，把这当作是一种命定的现象。其实，五六十年代如苗秀的《火浪》，姚紫的《窝浪拉里》、李汝琳的《旋涡》、李过的《浮动地狱》、原向的《青春的哭泣》、杜红的《五月》等，就都跳出这个题材偏狭的胡同，而面对社会和历史发表了作家的“宣言”。那种命定观念在理论上是短视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它将把华文文学创作题材导入歧途。

也有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新加坡战后，特别是独立20多年来处于和平盛世，创作题材的开拓，难免存在着客观局限。这种见解，自然不无道理，但也不能成为创作题材倾斜的依据，深一层思考的话，新加坡华文创作题材仍是一个无比丰厚的宝矿。新加坡共和国20多年，且不提那些带敏感性的题材，即以新加坡社会生活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科学技术的昌明，社会文明的风尚，公民意识的始发……都是可歌可泣的创作题材；至于社会生活的另一面，如西方文化的渗透，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人际关系的尔虞我诈，生活意识上的拜金主义，国家暴力的隐忧……不都是惊心动魄的创作题材吗？同时，有一些身边琐事，只要加以扩展与深化，把它们与上述种种社会现实焊接起来，

不是也可把“家事”与“国事”串通？从创作题材的视角来说，也不失是一种开拓吧。

如果由此上溯到近百年来的移民史、劳工史、殖民史、开埠史以及源远流长的文化史、华人家族的兴衰，宗亲组织的杠杆作用……等等，为新华作家提供的创作题材，就更广阔而丰富了。只要作家不满足于一己之精神享受，不囿于个人狭窄的生活圈子，一味去抒写一己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而能切入时代，贴近生活，不断锤炼自己的艺术观察力与概括力，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创作题材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对于渴望走出国界的新华文学，就当前的创作状况来说，非大力提倡创作题材的开拓，是不容易产生伟大作品的。我始终相信各国文学史所提供的这样一条成功的经验——伟大的作品产生于伟大的题材。

其实，这本来是一个老掉牙的问题。记得40年代末期，许多老一辈的作家就提出反映此时此地的重大题材的问题。最近读赵戎发表于1975年的《新马文学概论》，在谈到新马华文文学的世界影响时说：“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度里，它底变化关系到国际未来，有这么划时代的伟大题材，应该写出划时代的伟大作品，来献给世界文坛，而为国家尽一份力量。”赵戎先生虽已作古，他的遗言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泽。

五

又譬如，要流派，不要宗派。

新马华文文学史料表明，新马华文文学是在中国五四新

文学运动的影响下萌发的，它同时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传统。不论叫做创作方法，还是称为文学流派，这个传统一直被承认为新华文学创作的主派，视为正宗。直到五、六十年代才开始从西方、特别是台港输入的现代主义，并曾风行一时，这样便导致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两大流派的一场争论。本来，这种争论是正常的，但由于曾造成一度的某些紊乱，甚至挫伤过部分作家的感情。现在，两大派不论在西方、在台湾、还是在大陆（包括香港），虽仍各举自己的旗帜，却开始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学习，甚至出现合流的趋势，著名作家海明威便有明显的“一身二任”的倾向，台湾的乡土文学与现代文学作家更是在各取所长，各沿着一条健康积极的路子前进。

作为一种文学流派，一种创作方法，各有其产生的历史的，社会的条件，从美学情趣与艺术手法来说，更是各有各的追求、创造；可能各有长短，但说不上你高我低，你正我邪之分。文学实践表明：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可以写出传世之作；运用现代主义创作方法，也产生过伟大作品。新加坡华文作家立足于一个多元世界——多元经济、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多元语言，势必促使文学艺术流派与方法的多元化。文学家、艺术家这种由原来的一种选择走向多元选择也是必然的，这是文学艺术兴旺发达的标志。我以为，只要作家面向世界，面向现实，面向人生，无论运用什么创作方法，属于什么流派，都有可能写出读者所喜闻乐见的成功作品。

同时，现实主义自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中国，还在50年代就有人提出“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问题和“现实

主义的深化”问题；在苏联，六十年代也有人提出“开放的现实主义”问题和“七十年代的现实主义”问题。提出问题的理论家都是信奉现实主义的，但他们从实践中认识到现实主义的时代性问题，要求随着历史、社会的发展，而考察现实主义自身的发展，反对把传统的现实主义变成封闭的，僵死的现实主义。自然，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是一个很有潜力的文学理论问题，要进行认真的研究，不要轻率地作出结论。

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无知或偏见，文学流派和创作方法的问题被扭曲了，变成一种门户之见，甚至不共戴天，形成为宗派的活动，从而严重地影响文学的发展和文学艺术界的团结。

六

再譬如，文学评论的发展。

当前，新加坡华文文学批评的风气，比起40多年前我在新马时的情况，应该说有了了不起的进展。不过，从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资料看来，新华文学评论工作的开展，仍然远远落后于文学创作。成熟的批评和成熟的批评家显然不多，而捧杀和骂杀的“批评”则时有所见，尤其是一些非常不严肃的，“眉头一皱”式的批评经常骚扰文坛，完全丧失了文学批评所应有的襟怀和品格。这种跛行状态极不利于文学创作水平的继续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妨碍着新华文学理论的建设。这就难怪新华文艺界的有识之士认为：发展我国的文艺批评是当务之急了。

《新加坡华文作家作品论》作为对新加坡华文文学的评

论集，我并不认为入集的评论文字都是可取的。严格地说，其中对某一作家作品的某一评点，不免有溢美之词，或则可能失之苛求。但是，从总体来说，陈实君还是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力求评论的深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评论者与创作者的正常关系。显然，它基本上克服了文学批评界的不良风气，对新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起着促进的作用。

别林斯基提出过一个十分深刻的命题：文学批评是文学创作的继续。人们常常误解了批评与创作、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关系，似乎批评对创作，要么是说尽好话，要么是吹毛求疵，批评家与作家，要么是好友，要么是冤家，这种观念极大地妨碍文学批评的开展。按别林斯基的命题，两者的关系应从外在的关系转化为内在的关系，成为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事实上本来就是如此，优秀的批评家除了象鲁迅所说的“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之外，还应该科学地将隐藏在文学作品深处的，不易为读者理解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挖掘出来，帮助读者从作品中接受更多更宝贵的东西，这不就是创作的继续吗！一部《红楼梦》，数百年来由于评论家作出的劳动，读者就象在一座宝矿掘进，至今未有止境。读《哈姆雷特》，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种不同的认识。这种继续表现批评家的素养，也成为作家创作的伸延。我想，用这样的观念来对待文学批评，用这样的态度来开展文学批评，就能正确地处理批评与创作、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把新华文学批评引上健康的发展道路，为提高新华文学水平作出贡献。

七

新加坡华文作家披荆斩棘，艰苦耕耘，创造了新华文学光辉的昨天与灿烂的今天，明天，这个被誉为花园岛国的华文文学花圃，将更加万紫千红，春色满园。我把陈实君这部远非完美的《新加坡华文作家作品论》评论集，当作是对我们所热爱的新加坡华文文学的一种奉献，这种激情也引发了我对我的“第二故乡”华文文学事业发展的关切和期望，为了新华文学的明天，如果我说了什么错话，万望海涵。

是为序。

杨 越

1990年春

目 录

维纳斯的侍者.....	(1)
艺术的勇者和雄者.....	(10)
象英培安这样一个作家.....	(16)
《船民》的领域.....	(22)
现代儒生的孤独.....	(32)
苗秀前期小说创作论.....	(49)
孙爱玲印象.....	(69)
在没有渡船的地方.....	(78)
蓉子小说中的女性世界.....	(87)
从《蜈蚣岭》看流军的小说创作.....	(97)
热带岛国的心灵律动.....	(110)
八诗人札记.....	(122)
原甸.....	(122)
周槃.....	(134)
淡莹.....	(147)
苗芒.....	(163)
杜红.....	(176)
巨人与现代风.....	(192)
郭永秀的童话与现实.....	(203)
花凋内外.....	(214)
方修的贡献.....	(225)
后记.....	(241)

维纳斯的侍者

当一个人把自己称为维纳斯的侍者的时候，那便意味着他将决心为爱和美而献身。为了把爱宣示于人，把美揭示于人，他还得准备象爱神与美神维纳斯那样，隐忍种种不公正的待遇。

忠扬便是一位维纳斯的忠实者。

在现代都市生活程式化、机械化的世界里，人们尽可以舒舒服服地去适应共同的生活方式，不必为个性的有无而苦恼。在酒吧、夜总会、流行音乐、畅销书被金钱精致包装而真正的文学艺术成为散装葡萄酒的世界里，人们尽可以去追求官能刺激，发泄情感，逃避现实，逃避责任，在方生未死之间寻求意志的麻痹，而不必去关心信仰的依靠，价值的失据以及精神、道德等等这样一些与实际功利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

忠扬却始终以鲜明的爱憎、奔放的热情，积极而执着地“去追寻维纳斯女神的情影”，在文艺批评的园地里辛勤耕耘。坎坷的生活，消磨不了他的锐气；崎岖的道路，折损不了他的意志。他以坚强的个性，积极的人生态度和锋利的笔管，为香港和新马文坛升起了一面鲜艳的导航旗。

忠扬，原名陈鸿举，又署吕珊、纪梅、陈熙等，1938年生于新加坡，祖籍潮州。从50年代后期投入文学写作活动

起，在新马文坛便留下一串闪光的历史足迹：

1959年，与同期其他作家，出版合集丛书《文化问题及其它》，研究和探讨新马文化艺术诸问题。后来，主持编辑出版《星岛报》。该报是一份较侧重文艺的周报，对于打开当时新马文坛沉寂气氛，及推动文艺的发展，有过积极的作用，深得社会读者好评。1961年曾主持短期间的《星岛报》，同年应南洋大学中文学会的邀请，与宋丹（马德）、夏彬等参加该会主办的马华文艺座谈会，作题为《马华文艺的思想性》的讲话。1962年，为新加坡草原文化社主编文艺丛书，出版了3本专集，即《青之草》（小说集，高静朗著），《青春的哭泣》（诗歌集，原甸著）和《文学和人民》（文艺评论集，忠扬著）。这是一套颇具水平的丛书，每书出版不到一个月，即告售罄，在当时沉寂的文坛，曾传为佳话。接着，他又为新加坡长空文化社主编另一套丛书，出版的共计有：马阳的小说《天涯》，李夥的小说《野孩子》，顾军的小说《阳光与雾》，槐华的诗集《水塔放歌》。（马仑《新马华文作家群像》）

1963年，这位对新马华文文学理论有过积极建树的批评家，因生活的缘故离开新加坡一别文坛近20年。1980年，旅居香港的忠扬重返文坛，短短数年间，写下文艺评论、杂文、小说、散文近百万字，又一次名声鹊起，重振雄风，成为评论界的翘楚。

至今，忠扬为我们留下了八本著作，包括《文化问题及其他》（合著，1959年），《文学与人民》（评论集，1962年），《文苑纵笔》（评论集，1982年），《鸿爪集》（杂文集，1984年），《泼墨集》（杂文集，1985年），《新马文学论

评》（评论集，1986年）以及两本小说集《昨日梦华中》和《回首夕阳红》。在这些著作中，最能体现他的爱心和审美理想的，当推《新马文学论评》。

爱和美，是忠扬从事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的根本出发点。忠扬说：“没有爱心，必然对文艺就缺乏一种真正感情。没有真感情，你的创作，你的评论就只有一种自以为正确的所谓理性在操纵着你，你就会离开真实的基础。而根据你想像的，理性中认为应该的东西去创作、去评论，而不是立足于生活基础上所产生的真实感情去创造美、评价美。”

对文艺的深沉的爱心，不仅使他本人在一个文不如商，从文“迹近于迂腐”的社会里，忍受难耐的寂寞，甘愿做一个“不可救药的迂腐者”，而且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时刻关注着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近年来，改变新马华文文学落后状况，挽救华文文学危机成为新马文艺界的重要课题，“落后论”和“危机论”成为一个怪影，笼罩着新马文坛，腐蚀着新马华文作家的自尊和自信。忠扬力排众议，分析了新马华文文学的历史和现状，从新马华文文学发展的总趋向、艺术的社会功能和对待文学价值的态度三个方面，指出新马华文文学从50年代以来，健康的、积极的、艺术性的文学，一直是统领着文学的主流；新马华文文学二、三十年来的发展以及所遵循的道德，完全无愧于社会与民族的利益要求，它不仅配合着新马民族主义运动，而且体现出有利于人类社会精神的道德教育作用；新马文坛一向也不把文学作为一种纯粹的商品，作家也不以从事文学作为一种谋生的行为或以自己的作品去投合小市民阅读兴趣的市场需要。因此，新马华族文学“非但不是落后的，反而是先进的，是代表着人

类社会艺术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的，是继承人类文化历史，尤其是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优良传统”的，新马华文文学作家应该“珍惜自己的先进性，正视自己的落后性”，去摧毁新马华文文学发展的不利条件，激发新马华文文学发展的飞跃。这种见解，无疑是语惊四座，震聋发聩的。

忠扬在他几十年的文艺生涯中，在新马华文文学错综复杂的现象面前，能够不断地保持卓尔不群的批评姿态，根本的原因，来自于他对新马华文文学的深刻理解。他始终把新马华文文学看成是一种民族文学，把新马华文文学的前途与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前途联系在一起。在五、六十年代的文艺批评中，他积极倡导了文艺创作的爱国主义和现实主义原则，要求文艺创作与新马人民爱国事业相结合，发扬新马人民的民族新尊严，提倡民族的自觉与自尊以满足广大人民精神生活的要求。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使他的批评获得了强大的内驱力。80年代他重返文坛后，初志不改，继续倡导了文艺创作中的这种民族精神，强调新马华文文学的新起点和民族文学的重建，应基于新马社会和民族的利益，维护新马民族的尊严，使之富于新马民族特色。忠扬之所以反对不问情由地照搬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反对文学中的“崇港风”，正是对这种文学民族精神的深邃理解与精确把握所激发的文化自觉的表现。

基于对新马华文文学民族的理解，忠扬十分重视文学史的研究。在《重视文学史的研究工作》一文中，忠扬指出：

“任何一个华族作家，无论是搞创作的或是搞理论批评的，如果不懂得自己文学历史的过去，就不可能真正懂得我们的文学何以有今天的现状；而不懂得自己民族文学历史的过去

和今天的现状，就不可能正确地去憧憬文学历史的未来。对于自己民族文学历史的无知，也就意味着对未来文学发展的朦胧。因此，我们的作家对于如何去继承文学史上的优良传统，以及如何努力沿着文学历史发展的轨迹，推动文学朝着更广阔更高峰的未来去发展，也就失去了方向，没有了依据。这就难怪一二十年来，我们的文学活动一直盘旋于盲目和混乱之中。而作家们的创作活动，由于对民族文学历史知识的缺乏，则往往是基于个人的兴趣出发，没有真正把个人的文学活动，视为是推动国家、民族、社会文化艺术发展的一种职责。”为此，他高度赞扬了新加坡著名文学史家方修的治学工作，充分肯定了方修对新马文学史的贡献，并严肃批评了新马文学界两种不良倾向——“对文学现状自我菲薄的民族文学自卑感”和“对文学现状自我陶醉的个人文学优越感”。忠扬正确指出，自卑感必然导致对传统的忽视和排斥而转向崇洋媚外，唯别的地区、别的民族文学马首是瞻，使华族文学成为一种附庸、传声筒或复制品，从而加速华族文学的衰微和变种。优越感则来自对本民族文学历史的无知和认识的机械化（即忠扬所批评的“套用进化论”解释民族文学发展的观点），它将作家个人的文学活动与文学发展的传统性割裂开来，与民族文学的运动隔绝起来，无视和否定文学的历史传统和历史成就，其终极是走向民族大多数所不能认同的文学牛角尖的绝路。

可以看到，对新马华族的热爱，对新马民族精神的坚持，使忠扬的批评中活跃着一个强大的灵魂，使他的批评具有一种社会历史学家的恢宏眼光，一种高屋建瓴的气势。这成为忠扬文艺批评中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也是他对新马华文文

学的突出贡献。忠扬笔下时时流露出的民族精神的热情，不仅是新马华族知识分子文化精神觉醒的表现，更重要的，是象新马华族这样一个脱离母体在异地生根的民族，只有树立本民族的主体精神，才能在文学上获得独特的感知和认知世界的方式，获得独特的审美眼光，获得广阔的文化视野，使新马华文文学走出逼仄的路子，产生出真正属于本民族的文学。

忠扬的文艺批评不仅拥有一定的理论高度，而且是与新马华文文学的现实紧密相联的。他对新马华文文学运动中的每一个发展过程，每一个现象的涌现，每一个细小的变化，都保持着敏锐的嗅觉，并以坦率的批评参与和介入其中。

创作技巧，是长期困扰新马华文文学创作的问题。漫长的殖民史和反殖民斗争史、东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历史和现状、新马人民在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社会变动和现实生活，为广大新马华文作家提供了广阔丰富的文学素材和原料。可是，实际情况是，虽然新马华文文学界不乏思想成熟，文字熟练的作家，却缺乏成熟的作品，重要原因之一是长期以来对创作技巧的忽视，尤其是中国大陆曾一度泛滥过的“左倾”文艺思潮对新马华文界的不良影响，造成许多作家如忠扬所说那样“不愿多谈技巧问题”，阻塞了新马华文文学应有的提高。针对这种情况，重返文坛的忠扬明确提出了“在广阔、丰富的生活基础上，在积极健康思想的指导下，大胆地钻研、提高艺术技巧水平”的口号（见《努力提高创作技巧》），喊出了广大新马华文作家急待突破旧的文学格局、创新新马华文文学的心声。

传统与创新问题，也是新马华文文坛的一个理论热点。

60年代以来，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经台港等地传入新马华文文坛，引起了观念的变化与争论。忠扬站在现实主义立场，批评了否定传统的“唯新论”，主张有分析有批判地接受和吸取西方现代文学中合理的可取的成分，在原有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去创新，以促进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忠扬鲜明的现实主义态度，在多元化的新马华文文坛，成为一种观念的代表，丰富了新马华文文坛的面貌。

批评的使命在于表达优秀读者的意见并促使这种意见在广大群众中传播。健康的批评和健康的批评风气才能保证文艺批评达到剪除恶草、灌溉佳花的效果，达到将优秀读者的意见传播开去的目的。粗暴的、不文明乃至不学无术的批评导致文艺队伍的感情破裂和人心涣散，直接影响到文学的发展，在新华文学史上曾留下过沉痛的教训。在许多场合，忠扬对那些“左道旁门的无谓之争”和“不正派的手法和态度”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认为：“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学评论开展得越是蓬勃，越是正常，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民族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运动越是繁荣兴盛，相反，则是趋于衰微落后。”因此，他一方面主张批评家应有疾恶如仇的态度，敢于评说、敢于规劝、敢于针砭、敢于批判，另一方面，又强调批评家应该怀着巨大的文学爱心，鼓励、爱护作家，以商讨式、启发式的方法，引导作家认识自己的创作。他提倡开放的论争风气，又强调开展有意义、有建设性、有指导作用和有利于文学发展与水平提高的论争和评论。他还特别强调结合新马华文文坛实际，根据不同程度情况，宽松或严格批评的标准和尺度，不要苛求作家。这些意见，对今日新马华文文学的建设都有积极的现实意义。